

现代化、权威危机与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

孔 凡 义

[摘 要] 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是一种特殊的军人政权,它是军人干政的产物。军人干政是由军队组织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双重因素决定的。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表现出很强的不适应性,从而引发权威危机,导致君主专制制度的崩溃,并为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 现代化;权威危机;军阀政治;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9)03-0348-05

军人干政和军人政权研究是比较政治学和发展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研究框架,用以解释军人干政和军人政权兴起的原因。这些研究框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从军人自身发现军人干政和军人政权的起因。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强调军人的特性促使他们具有政治干预的能力,诸如技术专业知识和训练、团结、等级组织或民族主义取向。杰诺维茨是这一理论类型的代表人物。杰诺维茨认为,新兴国家军事组织在组织建制、技术构成和职业优势、社会录用和教育、职业和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凝聚力、政治干预等方面的特性,有助于解释新兴国家的军人行为模式^[1](第 27-30 页)。军人干政和军人政权解释的第二个类型不是在军人内部而是在他们所存在的国家结构或社会条件中寻找军人干政和军人政权的起因。亨廷顿是这一理论类型的集大成者。亨廷顿在其著作中说明了这种方法,“因为军队干预政治的最重要原因不是来自军事方面,而是来自政治方面,它所反映的不是军队体制在社会和组织方面的特点,而是社会在政治上和制度上的结构问题。”^[2](第 177 页)亨廷顿的理论认为,“普力夺主义”发生在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滞后于政治参与扩大的时候。其它的学者也关注了系统失衡的类似情况——经济混乱、政治失序或社会冲突——为军人干政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根据这种理论方法,军人被吸引到政治中,是因为公民政府的失灵或者是文人政府未能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第三种理论类型认为军人干政和军人政权既有军队组织的因素,也有环境的因素。芬纳是坚持这种论调的学者之一。芬纳认为,军人干政和军人政权是由军事组织内外因素共同决定的。在军事组织内部,军队的动机和氛围是军人干政的内因;在军事组织外部,大量军人干政机会的出现是军人干政的客观条件^[3](第 20 页)。

具体到近代中国军阀政治,其起始动力来源于现代化的冲击。现代化引发了中国君主政治的危机,进而导致中国君主政治的崩溃。君主政治的崩溃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权威危机。权威危机的不断深化促进了政治军事化的合法化,军人干政普遍盛行。最终,护国战争摧毁了中国的一体化权威,中国军阀政治正式走上历史的舞台。

一、现代化与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崩溃

中国传统君主政治在应对现代化危机方面表现出非常强的不适应性。

第一,中央集权体制的惰性。西方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多元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大多是封建制结构。在封建制结构下,社会的权力是分散和支离破碎的。这种社会结构在面临现代化的挑战时不像中国的官僚制结构那样具有很强的抗拒能力。同时,这种社会结构是比较分化的。它们由较为特殊和复杂的群体与阶层组成,诸如各种土地贵族、从事多种经营的农民以及强大的宗教团体和组织。这些复杂的集团和阶层对王权的膨胀起着抑制作用,客观上为公民社会冲破传统社会的藩篱创造了空间。正如摩尔指出的,“在英国民主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拥有土地的乡绅和贵族具

有不依赖于王权的独立性,这是很重要的。”^[4](第30页)这种比较分化和多元的社会结构富有更多的弹性,能够比较容易地容纳新生的现代阶层和现代政治制度,对现代化政治具有更强的适应性。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和资源,对内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对外也无力应付外敌的挑战,国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的现代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政治现代化所必需的两个先决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政治现代化无从起飞。相对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官僚制比日本的封建制更难向现代政治转型。

第二,中华文化中心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力与认同感使中国社会在面临来自国外强大的现代化压力情况下,仍然能保持自身的完整,因而耽搁了政治现代化的转型过程^[5](第111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惰性这一点在西方学者眼里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对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的研究颇有建树的美国学者派伊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步履蹒跚的重要原因。他指出,“中国人普遍认为,由于他们过去曾经拥有伟大的文明,因此他们现代化的经验一定和其他不具备这项条件的国家大相径庭。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遭到劫难的巨人,而不是一个试图适应现代化生活的老顽固。这便是中国近百年来无法应付外来强烈挑战的关键性因素。”^[6](第2页)罗兹曼对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比较,也认为中国之所以未能像日本那样顺利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转型,其原因在于传统中国体现在官方意识形态规范理念中的中国世界观有碍于中国人的灵活应变性^[7](第32页)。中华文化中心论妨碍了中国接受外来的先进技术、文化和制度,从而阻碍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革新。

中国传统政治即君主专制制度上的两个方面的不适应性,导致了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严重的政治危机。

首先,统治合法性危机。满清王朝在帝国主义面前表现出极度的无能,使人们对王朝的统治能力产生了怀疑。“抵御外侮与应付内部挑战的双重目标并不相互排斥。到20世纪初,国家存亡与皇朝安危已经纠缠在一起,而且后者依赖于前者。汉民族主义和排满情绪的增长,与其说由异族统治导致的,还不如说是清政府的软弱以及对列强不成功的外交造成的。这样理解才能解释,为什么满清统治者在最后几年中渴望实行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而且他们自己也正视国家和皇朝面临的问题。因为一旦国家崩溃,清皇朝将随之倒塌。反之,如果国家免遭外来威胁,清皇朝就会觉得它自己在对付内部问题上处于更强有力的位置。”^[8](第23页)帝国主义的强大也打破了中华文化中心主义的神话,彻底地暴露出传统中国文化的劣势。吸收了儒家文化并以此为根基的满清王朝在强大的西方文明冲击下显得明显的力不从心。占据中国历史达两千多年的传统权威开始遭到质疑。

其次,非控制性政治变迁。帝国主义入侵迫使满清政府不断对自身的政治体制进行调整和改变。由于这些政治变迁是一种外部强制性的政治变迁,所以在许多情况下政治变迁脱离了满清王朝所能控制的轨道。例如,为了适应鸦片战争开设通商口岸的需要,满清政府设立了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职位,打破了中央集权状态,权力重心开始下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皇帝出逃也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变化,“一是中央方面,渐启佞幸揽权之机;二是地方势力渐次加重”^[9](第100页)。这些政治体制的变迁是满清王朝被迫而为之,削弱了它对中国政治变迁的操控能力。从此,中国政治变迁日益超出了满清王朝所能控制的轨道。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被迫下放军事权于督抚,军事地方化开始萌芽。为了提高军事效率,清政府不得以放松了原有的军事控制。

再次,王朝政治资源流失。晚清王朝在帝国主义面前的节节败退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王权曾有的权威,王朝政治显得不堪一击。同时,帝国主义通过战争要求晚清政府赔偿的巨额外债,使晚清政府的中央财政陷入崩溃之中。此外,帝国主义入侵的不断深入,打断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大大打击了晚清帝国的军事能力。如在甲午战争中,洋务派所建立的现代化军队迅即灰飞烟灭。

最后,政治精英的分裂。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于如何应对中国的政治危机,政治精英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的政治分裂。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出现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分裂;19世纪末出现了改良派和保守派的分裂;20世纪初中国又出现了保皇派和革命派的分裂。这三次重大的政治精英分裂虽然使政治精英不断从满清政权中脱离出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在中国权威重塑和国家重建方面达成共识,致使而后的宪政建设缺乏足够的政治认同。同时,中央政权在帝国主义和革命起义的双重冲击下已经失去了控制能力,地方政权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概括起来,清政府地方势力在洪杨战役中的变化,不外两点:一是督抚取得了军事上的实权,其势渐重;二是军队由单元体化为多元体,中央失去把握之权。这两点是清廷颠覆的诱因,也是民国时代军阀割据的诱因。”^[9](第106页)政权危机的频繁出现,迫使暴力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清朝晚期,传统政权已经失去了合法性的支撑,制度在解决政治冲突方面表现得无能无力,由此,暴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凭藉。

自1840年以来,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危机日益加深,最终在20世纪初分崩离析。首先是君主王朝危机:19世纪中期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这次农民起义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君主政治的原有平衡,原有的军事分权体制被打破,地方政权开始崛起。其次是君主专制危机:19世纪末戊戌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绝对君主政体提出了挑

战,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是它促进了现代政治在中国的传播。最后是君主政治危机:革命党人试图通过革命建立共和政体以取代君主政体。这三种危机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先是王朝危机,然后是君主专制危机,最后是君主政体危机,反映了君主政治危机不断加深的过程。三种危机不断积累,从而引发了辛亥革命。所以,辛亥革命不仅意味着清王朝的崩溃,也意味着君主专制的崩溃,更意味着君主政体的崩溃。

二、权威危机与政治军事化在中国的合法化

中国传统社会在西方的冲击下迅速、全面地瓦解,从而出现了派伊所谓的政治发展危机,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10](第 63-66 页)。其实,这六种危机都是现代化的权威危机在某一方面的表现。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当传统权威面对现代政治文化时,就会出现认同危机。传统权威和现代权威的合法性类型是不同的,所以在现代化转型时权威会面临合法性的类型转换问题。一旦出现权威危机,权威得到服从的程度就会大大降低,因而权威的渗透就会遇到障碍。现代化是一个政治参与爆炸性增长的过程,当权威无法吸纳政治参与时,参与危机就出现了。由于权威出现了危机,则权威会分散,它在整合社会时就会出现困难。同样地,权威危机的出现也会为社会资源的分配带来困难或增加资源分配的成本。

就近代中国政治而言,权威危机主要体现为权威主体危机、权威合法性危机和权威一体化危机。近代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政治逐渐解体,新的权威主体不断涌现。而且,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社会成员的政治意识也日益倾向多样化,他们很难服从单一的政治权威,出现了几种权威合法性类型共存的局面。传统合法性尚未消逝,魅力型合法性和法理型合法性业已出现。权威危机的爆发会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这就为秩序庇护者——军人提供了机遇。当非暴力的权威无法带来秩序时,政治军事化就成为可能了。“源于民国初期政治权威危机的政治军事化为军阀主义的兴起创造了关键的环境。在这些环境下,军人断言他们被政客所‘利用’具有某些真实性。的确,军人被动员进入政治领域,不是为了建立军人的政治权力,而是为了解决文人政治表面上不可调和的冲突,来自文人政客要求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定和来自军人本身的一样多。不幸的是,求助于军事力量不仅没有结束政治权威危机而且由于鼓励了进一步的政治分裂而使之恶化。这些环境也为军事将领野心的表现提供了条件。”^[11](第 311 页)20 世纪初持续不断的权威危机一步步把中国推进了政治军事化的漩涡。20 世纪初的三次政治事件使中国政治军事化获得了合法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

辛亥革命是政治军事化在近代中国政治中的一次重大演出。晚清政府的政治改革失去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信任。一方面,晚清政府不愿向现代政治转型,也没有足够的权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革命党人要建立现代共和国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权威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以晚清政府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和以革命党人为代表的现代政治之间无法达成妥协。因此,他们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暴力来解决。辛亥革命是军事政治化的产物,并且使军事政治化进一步合法化。当然,辛亥革命军事政治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军人政府。辛亥革命后,许多军队都被解散,且建立了文人政府和中央政府。所以,它和军阀时期持续的政治军事化是不同的。

在袁氏当国的时代,中国政治的权威危机并没有得到解决。在中央这一层次,总统制和内阁制之争仍然在进行之中。总统、总理和议会之间的权力界限还没有厘清,三者之间的权力冲突相当频繁。在地方这一层次,袁世凯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确立统一的地方政府系统。袁世凯宣布所有地方政权都必须按固定模式组成,颁布了建立文职人员考试制度的法令,还发布了关于军队禁止参与政治的禁令^[12](第 129-134 页)。但是,他试图重建权威系统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反而引发了更严重的权威危机。袁世凯试图通过枪杀宋教仁来打击国民党的势力,但遭到了国民党的激烈反抗,从而引发了“二次革命”。“二次革命”进一步使中国的政治军事化了,军事再一次成为决定政治的手段。

复辟帝制不仅使袁世凯在全国的权威受到普遍的质疑,而且也引起了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内部的权威矛盾,其最终还是通过战争来解决,即“护国运动”。护国运动的成功似乎再一次为政治军事化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为政治军事化的泛滥奠定了基础。护国运动实际是近代中国军阀政治形成的直接原因。它虽然推翻了袁氏政权,但却无力建立统一的民主政权,反而客观上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化和军事政治化。自此,中国军阀政治形成的外部条件成熟了。

三、权威崩溃与中国军阀政治的最后形成

护国运动虽然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企图,但是它并没有达到保护“共和国”的目的。以袁世凯为轴心的中央权威消失了,权力变成了碎片化的状态。军阀组织彻底失去了外在的权威束缚,成为了中国政治的主导力量,中国进入了军阀政治的时代。

在袁氏当政时代,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控制着中央政权,是对内政权和对外主权的代表,基本保持着对全国

的控制。并且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只要袁世凯活着,只要他的北洋机构是统治军队的力量,就能维持国家表面的统一。1916年袁世凯死后,那些被抑制的力量开始活动。这些军人立刻卷进了国家政治的漩涡之中。他们开始争夺领土和资源。”^[13](第15页)在袁世凯当政期间,两个相互联系的现象的出现对未来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一是没有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和有效的议会政府体制;另一个是省军事主义——军阀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4](第48页)

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统治,唯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权威人物不存在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袁世凯的突然死亡,中央权威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袁世凯试图复辟帝国政府的失败为军事主义反对者和省的脱离打开了水闸,同时他在1916年6月的死亡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在清朝灭亡后曾经证明有能力维持对中国一定程度的中央控制的人物。”^[15](第7页)袁世凯的死亡意味着中央权威的崩溃和权威重建希望的破灭,也意味着中国进入权力均势的时代。

袁世凯的死亡改变了原有的权威格局。在袁世凯当政时代,中央的政治和军事权力要高于地方,袁世凯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要明显强于地方势力。但是,袁世凯死亡以后,这种权力非平衡格局被改变了。中央的政治和军事权力被其老部下所分割,并且以地方为依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形成了力量的平衡。“北洋军,只要它是统一的,它就给中国带来一定的统一。把这支军队连接在一起的是对袁世凯的忠诚和服从,当他死后这支军队分裂成由袁世凯主要将领统治下的小地盘。这些军队运用每一种可能的方式包括战争来为地区和国家权力而斗争。北洋集团的崩溃允许非北洋集团——其他中央政府军队和省军队——宣告和寻求他们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在以前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的。袁的死亡揭开了各省将领无限制地追求省或个人目标的时代,无休止的战争、掠夺式的榨取和土匪蹂躏着国家。这就是军阀时期。”^[14](第57页)袁世凯所拥有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被分割,这些被分割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与袁世凯当政时代的地方实力派构成中国主要的政治势力。

护国战争打倒了旧的政治权威,但是没有建立新的政治权威。各地方实力派之间无法在制度、权威上达成共识,权威一体化彻底被终结了,中国政治进入权威碎片化^②的时代。“继续存在的政治危机和政治权威的碎片化推动了政治持续地军事化。面对着似乎不可调和的政治冲突,就不能禁止使用武力来反对那些被认为是非法权威的人。同样地,那些试图确立自己政治主张的人除了使用武力来对抗那些拒绝其权威的人之外也没有其它的办法。因此,政治权威持续不断的危机导致军事冲突和内战的继续。”^[11](第245页)

由此可见,军事政治化、政治军事化和权力碎片化在1916年的护国战争后汇合在了一起。在1916年护国战争中,各军事组织表现出对于政的强烈冲动,他们纷纷在各地建立了军人主导下的政权。1916年的护国战争也进一步地走向了政治军事化,政治越来越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这些情况的相互作用以军阀主义的最终胜利达到顶点。政治军事化和持续不断的内战,强化了军事将领的政治影响。政治权威竞争性中心的存在给军人额外的杠杆以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数量日益增多的将领利用面前的政治机遇向军阀主义转型。”^[11](第246页)而且,护国战争也打破了原来的权力格局,形成了相互平衡的权力格局。原有的一体化权威崩溃了,当权威无法决定政治的时候,军事斗争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自此,近代中国军阀政治完全形成了。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产生机理与其他国家的军人干政和军人政权相比,既有共同性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是一种特殊的军人政权,它是军人干政的产物。军人干政是由军队组织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双重因素决定的。军人干政不仅仅是由军人组织自身决定的,它还需要军人干政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从根本上讲,中国军阀政治是一种分裂的军人政治,它是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产物。在中国军阀政治下,军人在政权控制中居于主导地位,军人干预政治,政治成败决定于军事实力,政治竞争依赖于军事斗争,政治运作采用军事手段,这些特征也是军人政治所拥有的。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军人政权的共同特征。但是,中国军阀政治的政权是分裂的。在袁世凯暴亡后,中国被各地的军事强人所控制。这些军事强人也就是军阀都没有足够的实力来统一中国。中国表面上存在着一个中央政府,但实际上政权处于分裂的状态。中国军阀政治表现出强烈的派系主义特征。这与其他地区的军人政权有很大的不同,拉美、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军人政权和军人政治往往是统一的政权。这就决定了中国军阀政治的产生比其它国家军人政权更加复杂,那就是现代化危机导致了权威碎片化,它推进了中国的军人政治走向分裂。这是中国军阀政治所独具的特点。

注 释:

① 军事政治化是指军人广泛地干预政治,军事主要担负政治竞争的职能。政治军事化是指政治竞争通过军事手段进行,政治以军事为凭藉,政治竞争的成败决定于军事力量的强弱。

② 所谓碎片化的权威是介于原子化的权威和一体化的权威之间的权威形态。它不像原子化的权威那样极端地分散,

也没有一体化的权威那样整齐有序。在一定的地域或政治组织之内,政治权威是一体化的。但是在一定的地域与一定的地域之间、一定的政治组织与一定的政治组织之间,政治权威又是分隔的。权威的碎片化意味着政治权威是呈碎片状的和块状的。

[参 考 文 献]

- [1] Janowitz, Morris. 1964.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美]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 [3] Finer, Samuel E. 1975.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4] [美]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 [5] [美]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6] [美] 派伊:《中国人的政治文化》,胡祖庆译,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 1992 年版。
- [7] [美]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8] [澳] 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郭太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9] 李剑农:《中国近三百年政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10] Pye, Lucian W. 1999.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11] Mccord, Edward A. 1993. *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2] [加] 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傅志明、鲜于浩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13] [美] 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 [14] Sheridan, James E. 1975.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5] Kapp, Robert A. 1973.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 叶娟丽)

Modernization, Crisis of Authority and Appearance of Warlord Politics

Kong Fanyi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Wuhan 430073, Hubei, China)

Abstract: Modern warlord politics of China is one special military regime which is the outcome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The rise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depends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military organization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zation, the traditional absolute monarchy of China isn't fairly adaptive which results in the crisis of authori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All of these events pave the way for the form of Chinese warlord politics.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crisis of authority; warlord politics; modern China